

學術期刊數字出版模式探析

武京閩

[提 要] 伴隨著現代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的迅速發展，傳統學術期刊開始探索向數字出版轉型的路徑。從國內外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的發展過程看，學術期刊的數字化可分為兩種模式：一是以內容提供商為主導的數字出版模式，二是以技術提供商和數據庫運營商為主導的數字出版模式。由於受到期刊成長環境及管理制度和運作模式的限制，我國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的發展主要採取了第二種模式。但從學術期刊的長期發展來看，以技術為主導的數字出版模式存在著不容忽視的問題。學術期刊要想獲得持久的生命力，必須走以內容為主導、以技術為推動的數字出版之路。

[關鍵詞] 學術期刊 傳統出版 數字出版模式 轉型

[中圖分類號] G237.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4) 03 - 0102 - 09

從 20 世紀 90 年代開始，學術期刊的數字化進程推進速度很快，數字化已經成為學術期刊無法繞過的節點，不管你願不願意，計算機和互聯網的廣泛使用已經改變了人們的閱讀方式、信息獲取途徑甚至生活方式，也給學術期刊的出版帶來了便利、效益和挑戰。在現代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迅猛發展的今天，已經不是討論要不要進行數字出版的問題了，而是要研究如何實現從傳統出版向數字出版轉型，什麼樣的數字出版有益於推動學術期刊更好地發展，學術期刊如何擺脫“不做等死，做了找死”的尷尬局面。本文將在對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的發展歷程進行回顧總結的同時，比較和分析國內外學術期刊採取的不同數字出版模式，提出在出版體制改革的背景下，學術期刊從傳統出版向數字出版的轉型應堅持以內容為主導、以技術為推動，唯有如此，學術期刊才能步入良性的發展軌道，獲得持久的生命力。

一、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發展過程的回顧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現代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的迅猛發展，不僅帶來了工業社會的重大變革，而且極大地推動了出版行業的發展，出版形態、傳播形態及方式、出版運作機制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人類進入傳播史上一個嶄新的年代——數字化、網絡化的傳播時代。

期刊的數字化進程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數字技術在期刊編輯業務中的應用。20 世紀 50 年代末，期刊的編輯開始使用電子技術，進行圖文處理和傳遞、創作藝術作品和廣告、排

版及日常管理工作。第二階段，數字傳播技術在期刊中的應用——電子期刊的發展。電子期刊是指以數字形式存儲在光、磁等儲存器上並通過本地或遠程閱讀的機讀型連續出版物。1961年在美國正式出版的《化學題錄》是世界上最早的用計算機編輯出版的電子期刊。隨著技術的發展，一些發達國家逐步採用計算機來儲存和檢索期刊文獻，電子期刊受到讀者的歡迎。電子期刊的發展經歷了連線電子期刊、單機型電子期刊和網絡型電子期刊三個階段。^①我們現在所說的數字出版是指第三代電子期刊——網絡型電子期刊，即期刊以數字化的方式在互聯網上的出版。而所謂從傳統出版向數字出版的轉型，即是指從基於紙質媒介的期刊出版形式轉向以計算機和網絡為核心的新的期刊出版形式。

綜觀國內外學術期刊數字化的過程，起主導性作用的主要是兩大主體，一是具有內容優勢的期刊出版單位，二是具有技術優勢的技術提供商和數據庫運營商。它們利用自己的優勢實現了傳統媒體與數字媒體的融合，為讀者提供了比傳統媒體更便利、更快捷、更廣泛的服務。

國外學術期刊的出版模式主要有大型出版集團模式、學會（協會）出版模式和期刊社經營模式等。世界主要的大型出版商大都將學術期刊的編輯出版作為一項重要的業務內容，擁有數百種甚至上千種學術期刊。例如，荷蘭 Elsevier 是世界上最大的醫學與其他科學文獻出版社之一，該公司旗下每年出版 2,000 種期刊；^②德國 Springer-Verlag 出版公司 2012 年出版 2,200 餘種英文科技期刊；^③美國 Sage 出版社是世界第五大學術出版商，每年出版 700 多種期刊；^④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 2014 年出版的期刊數也達到 356 種。^⑤這些國際知名出版商在數字技術開始應用於出版領域時，就意識到了發展數字技術可能會對學術期刊的傳播與出版產生重大影響，紛紛依託自身豐富的出版資源，搶佔了數字出版的先機，佔據了市場主導地位。一方面，它們將學術期刊的內容進行有效整合，建立了海量數據庫和特有資源庫，使原有的期刊內容實現了價值增值，創造了更大的贏利空間。Elsevier 早在 1960 年就開始了電子數據庫的建設，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又投入 5 億英鎊，建立了真正意義上的科技信息和數據平臺。2009 年，該公司提供的科技信息平臺和數據庫平臺服務的收入就達到了 65 億英鎊。2010 年，其數字出版業務的產值又比上一年增長了 37%。^⑥另一方面，它們根據讀者需求，調整營銷方式，比如在期刊銷售方面，採取了靈活的定價方式，對紙質出版物和數字出版物實行分別定價或捆綁定價銷售。應該說，這些大型學術期刊出版商在為讀者提供高質量內容的同時，充分利用數字技術和互聯網技術，實現了傳統媒體與數字媒體之間的相互補充和相互促進，保持了利益關係上的一致性，使這些有著較長歷史的“百年老店”能從容應對數字出版帶來的衝擊，煥發出勃勃生機。

在我國，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的發展則主要是由技術提供商和數據庫運營商推動的，這與我國學術期刊的出版狀況和管理體制有直接的關係。我國對學術期刊實行主管主辦制度，分散在全國各地的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中，屬於不同的地區、部門、行業、學校等，出版單位出版期刊的品種很少。有資料顯示，2009 年底我國有期刊 9,851 種，分別屬於數千家出版單位，即使是擁有期刊資源最多的單位，其擁有的原發期刊也不會超過 50 種。學術期刊的出版單位大多數是不具備獨立法人資格的編輯部或期刊社，規模普遍很小，多則幾十人，少的只有幾個人，而且期刊的編輯、出版、經營業務通常都是由期刊編輯部或期刊社承擔的；辦刊經費絕大部分來源於財政撥款和主辦單位投入，僅能維持編輯部或期刊社的基本運轉需要。另外，由於對出版單位實行的是嚴格的業務分工和專業分工，報紙、期刊和圖書等媒體之間的業務界限分明，創辦新刊需要經過嚴格的審批，因此期刊自身發展空間有限，也難以對不同單位、不同類型的媒體資源進行整合。在

這樣的情形下，傳統的學術期刊出版單位面對數字技術和互聯網技術對紙質出版的衝擊不知如何下手，一籌莫展。

我國學術期刊傳統管理體制和運行模式方面存在的問題阻礙了出版單位的數字化建設步伐，但也給那些目光深遠、有技術優勢的技術提供商和數據庫運營商創造了機會。從上世紀 90 年代開始，中國知網、萬方數據庫、重慶維普、龍源期刊網等數據庫陸續建立。這些數據庫利用其獨立於期刊主管主辦單位之外的有利地位，打破了地域及行業的界限，將分散在全國各地的學術期刊資源整合起來，形成了以技術提供和數據庫運營商為主導的期刊數字出版格局。這些數據庫或依託於國家研究機構，或自籌資金，借助國家政策、資源、項目等的支撐開展數字出版業務，發展迅速，在利用互聯網擴大學術期刊內容的更廣泛傳播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初步形成了我國期刊數字出版的產業形態。但相比於期刊產業發展的要求來看，這種學術期刊數字出版模式也暴露出一些問題：首先，幾大數據庫運營商幾乎同時起步，在發展過程中，雖然選取內容有所側重，但普遍存在著希望更多地佔有市場份額，形成壟斷或獨佔地位的傾向，因此，存在著產品和市場同一、內容大量重複的問題。其次，由於幾家數據庫的產品不具備不可替代的特徵，為搶佔市場，產品的定價明顯偏低，結果導致一方面在國內市場上的競爭加劇，另一方面在國際市場上却競爭力不足。再次，期刊數據庫屬於商業化經營，直接面對市場的壓力，贏利是其經營目標。而近幾年，在全球範圍內興起了學術期刊開放存取、免費閱讀浪潮，這顯然與數據庫運營商的經營目的不符，會對經營內容和資源掌握相對單一的數據庫的生存與發展形成極大的衝擊。第四，技術提供商和數據庫運營商大多是通過徵得出版單位授權的方式獲得了整合期刊資源的權利，在作者的著作權保護方面存在明顯的問題。

近年來，伴隨著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的發展，我國學術期刊數字出版呈現出新的變化。主要表現在：（1）傳統媒體開始試水數字出版，探尋數字化轉型之路。有越來越多的學術期刊在通過大型數據庫進行數字傳播的同時，借用計算機技術和網絡資源，搭建自己的數字傳播平臺，引入數字化的採編平臺系統，初步實現了收稿、編輯、出版、傳播的數字化。（2）期刊出版集團開始組建，集約化的學術期刊數字出版平臺出現，打破了數據庫一枝獨秀的局面。如前所述，我國學術期刊出版單位的規模較小，如自主發展數字出版，則會成本高，效益低，難以形成影響力和競爭力。2010 年 10 月，科學出版社正式註冊成立了北京中科期刊出版有限公司，吸引有學科代表性、行業代表性、地區代表性的 270 種優秀科技期刊加入科學出版社期刊集群，期刊集約化生產、數字化平臺建設、市場化推廣與營銷、國際交流、編輯培訓等出版服務，實現了科技期刊編輯出版、經營管理、技術諮詢、廣告發布、期刊營銷、業務培訓、數字出版等業務的一體化。

（3）從純商業化運作轉向商業化經營 + 公益性免費閱讀。2013 年 7 月 16 日，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數據庫上綫儀式在京舉行，該數據庫建設以“公益、開放、協同、權威”為定位，以整合學術期刊數據資源，推進學術資源的公益使用、開放共享，推進學術研究方法和手段創新，推進科研成果普及轉化，推動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為目標。計劃用兩年時間，完成學術期刊數據庫的建設工作；在“十二五”末，初步建成一個國家級、公益性、開放型的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數據庫。（4）期刊跨媒體出版平臺正在搭建。所謂跨媒體出版，是指可以跨過多種媒體來重新使用內容而無須對原來的內容進行重新製作。2010 年，北大方正電子有限公司推出了期刊跨媒體出版解決方案。該方案包括三個部分：一是建立一個完善的、面向未來的、全流程、全媒體內容生產平臺，以同時實現紙質期刊、電子期刊的快速製作。二是打造一個以期刊社的核心資產管理

為中心的全媒體媒資管理系統，實現數字期刊的自動化製作、按需出版及在新媒體應用平臺上的多渠道應用。三是搭建數字內容新媒體應用平臺，為期刊社提供多種新傳播媒介，為刊社及讀者之間的交流與溝通提供通道。^⑦

雖然媒介環境的變化推動了期刊數字化的發展，但從我國數字出版發展格局來看，數字期刊在數字出版產業中所佔的份額很小。2013年7月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發布了《2012~2013中國數字出版產業年度報告》，報告顯示：2012年我國數字出版產業整體收入規模為1,935.49億元，比2011年整體收入增長了40.47%。其中：互聯網廣告收入達753.1億元，網絡遊戲收入為569.6億元，手機出版（含手機彩鈴、鈴音、手機遊戲等）收入為486.5億元，博客收入為40億元，電子書（含網絡原創出版物）收入為31億元，在綫音樂收入為18.2億元，數字報紙（不含手機報）收入為15.9億元，互聯網期刊收入為10.83億元，網絡動漫收入為10.36億元。^⑧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出，數字期刊的收入僅略高於網絡動漫，在數字出版產業中所佔的份額僅為0.56%。中國期刊，特別是學術期刊從傳統出版向數字出版的轉型任重道遠。

二、以內容為主導、以技術作為推動，實現學術期刊數字化轉型

在互聯網和數字技術的衝擊下，近年來全球紙質媒體呈現出整體下行的趨勢，發行量和銷售額都大幅度下降，一些世界知名紙媒（如美國《新聞周刊》）甚至不得不宣布停止紙媒出版，只出數字版。就連世界上最知名也是最權威的《不列顛百科全書》也於2012年3月宣布停印英文的紙質版，全面轉向數字版。在這種情勢下，不少人認為紙質媒體即將走到盡頭。甚至有人認為，報刊將因此而面臨消亡。

實際上，紙張與互聯網一樣，都是學術期刊藉以傳播的一種介質。美國學者伊麗莎白·愛森斯坦在《作為變革動因的印刷機——早期近代歐洲的傳播與文化變革》一書中說：15世紀中葉興起於歐洲的機器印刷技術“改變了書籍生產、發行和消費的條件。但這種改變的完成方式是很具欺騙性的——它不是靠拋棄手抄書文化的產品，而是靠在前所未有的規模上複製手抄書文化的產品”。^⑨同樣，我們也不能因為紙質印刷量的減少就斷定學術期刊行將消亡，如同竹簡、羊皮一樣，紙張只是記錄文字內容的一種載體，依託於計算機和數字技術的互聯網及閱讀終端等也是如此。數字媒體的出現並不意味著學術期刊將至“末日”，它改變的不是學術期刊的內容和本質，而是改變了傳統的傳播形式和展示方式。數字媒體是紙質媒體的內容的擴展，彌補了紙質媒體傳播方式的不足，使學術期刊的內容得到多樣化的展現和更廣泛的傳播。

數字出版的快速發展與印刷技術的廣泛使用一樣，它們都是傳播史上的一次革命。美國媒介理論家保羅·萊文森曾提出“補償性媒介”（Remedial Medium）理論，認為人在媒介演化過程中進行著理性選擇：任何一種後繼的媒介都是一種補救措施，都是對過去的某一種先天不足功能的補救和補償。^⑩從學術期刊發展的歷史來看，它經歷了以印刷為主要技術支撐的平面化生存時期。在數字化時代，學術期刊要利用新的媒介技術，拓展生存空間，實現數字化生存和網絡化生存，換句話說，就是要通過多種媒體的融合，完成從傳統出版向數字出版的轉型。

所謂數字出版，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數字出版，是指紙質出版內容的數字化及其傳播。而廣義的數字出版則是指利用數字技術進行內容編輯加工，並通過網絡傳播數字內容產品的一種新型的出版方式，其主要特徵為內容生產的數字化、管理過程的數字化、產品形態的數字化和傳播渠道的數字化。^⑪我國學術期刊最早的數字出版應該是狹義的數字出版，現有的數據庫模式也

不過是對紙質出版物的二次傳播。近年來，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完善和人們對數字出版的認識日益深入，很多學術期刊已經突破狹義的數字出版界限。台灣出版人陳穎青指出：“完整精確地複製紙質書的內容與表現，如實地搬到網絡上的電子書模式，注定不會有前途。”^②努力探索和推進更廣意義上的、真正的數字出版成為學術期刊未來發展的必由之路。

對於學術期刊而言，數字化轉型將帶來如下變化：

首先，從傳播模式看，數字出版改變了紙質媒體“點對點”的單向傳播模式，變為傳播者與接受者之間互動式的雙向傳播，並進一步發展為社會網絡式傳播，傳播的範圍擴大了，傳播的速度加快了，傳播的成本降低了。

其次，從傳播載體看，從紙質印刷物這個單一載體發展為多種形式的電子文件和閱讀終端，從有形的實物載體轉變為無形的網絡化載體。載體形式的多樣性，使得讀者獲取內容的通道日益增多。特別是互聯網和數據庫的出現，使得人們在獲取學術信息時，廣泛地使用了搜索引擎，從而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時空的限制，打破了期刊的界限及學科、專業的界限，讀者能夠更容易地在浩如烟海的知識寶庫中找尋到對自己有價值的信息，“長尾效應”顯現。例如，在紙質學術期刊的使用中，人們對專業期刊的關注大於綜合性期刊，這並非一定意味著專業期刊的學術質量和影響力大於綜合性期刊，而是因為綜合性學術期刊所能給讀者提供的有用的、專業性強的信息量有限，其信息傳遞遇到障礙，而數字技術和互聯網技術有助於消除這種障礙。因為“互聯網是一個真正的‘疏而不漏’的‘天網’，大量在大眾市場中沒有價值（無法找到消費者）的產品都能在長尾市場中實現價值交換。”^③

第三，從編輯過程看，運用電腦和互聯網接收稿件、在電腦上編輯加工、利用專用軟件排版製作，在一個平臺上加工製作在多種媒體上發布的內容，工作效率提高了，出版周期大大縮短。特別是網絡投稿與審稿系統的使用，即能方便作者投稿、瞭解稿件的審稿狀況，也有利於期刊編輯過程的網絡化管理。

第四，從出版模式看，一方面，數字技術和互聯網的運用，可以改變傳統的按期出版模式，實現單篇文章的在線優先出版。另一方面，利用數字技術提供的集成平臺，可以打破紙質期刊各期內容相對獨立、缺乏聯繫的狀況，對期刊內容進行多次整合和深度加工，為讀者提供更全面、更精準的服務，使原有的期刊內容增值。

第五，從發行方式看，傳統學術期刊的發行受限於郵局的發行網絡，發行範圍有限，而且讀者如果需要閱讀其中的一篇文章，就需要支付整本期刊的價格；而實現數字出版以後，作者可以只對某本期刊中他所需要的那篇文章付費，或者對數據庫中的有價值的內容按下載頁面數量付費。目前在實現數字出版的出版社中已經有為單篇文章付費的形式。

展望學術期刊數字出版未來的發展，作為內容提供商的學術期刊出版單位應該在數字化轉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對比國內外不同的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發展過程，我們不難看出，由於國外大型出版集團較早地實現了學術期刊的集約化經營，認識到了發展數字出版的重要意義，所以，很好地完成了傳統出版和數字出版的融合，利用數字傳播技術對期刊內容進行了有效整合，使期刊價值更大化，形成了較好的數字出版贏利模式，為學術期刊從傳統出版向數字出版的轉型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反觀我國，雖然以技術為先導的數字出版模式順應了我國學術期刊發展的實際情況，推動了學術期刊數字化的發展，但我們必須承認，這種數字化發展模式是不得已而為之，雖然對學術成果的數字化傳播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但與此同時，也對學術期刊從傳統出版向數字出

版的轉型造成了一定的障礙，數據庫自身的發展也進入了“瓶頸”期。首先，我國幾大數據庫雖然運用搜索引擎、信息導航等工具為讀者查詢、閱讀所需的文獻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以至於改變了人們的信息獲取習慣，但是，我們也看到，數據庫模式的優勢在於對技術的掌握和創新，數據庫的內容僅僅是對紙質出版物內容的複製，而無法對龐大的數據庫資源進行深度加工。其次，數據庫運營商和內容提供商之間未形成良性互動和共贏局面。其原因在於，一方面，數據庫運營商雖然在數字技術的應用方面搶佔了先機，但因前期投入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有的運營商採用了負債經營的方式，面臨的風險和壓力很大。為了降低成本，他們與作為內容提供商的期刊社簽訂的利潤分成比例極低，只相當於國家規定的稿酬標準的最低綫。而且，這一標準並未隨著數據庫運營商經營狀況的好轉和盈利的增加而有所改變。另一方面，期刊社雖然也意識到了數字出版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但由於自身的規模小、資金少，不具備自主開發數字出版的基本技術條件，無奈之下，為了擴大傳播範圍，不得不以極低的價格將數字出版權拱手相讓，使得期刊編輯部從數據庫傳播中獲得的收益根本無法彌補紙質期刊發行銷量銳減所造成的損失。正是由於這兩方面的原因，學術期刊的利益受到嚴重侵蝕，未能實現與數據庫同步發展，學術期刊難以建立有益於長期發展的數字出版贏利模式，與數據庫之間的合作受到一定的限制，難以結成利益共同體。再次，幾大數據庫經過近二十年的建設，已經將我國絕大部分學術期刊的內容囊括在內，數據量很龐大，社會影響力和市場佔有率也都很大。雖然一些單位醞釀通過行政手段或市場手段對學術期刊及其內容資源進行整合，借鑒國外大型出版集團的模式，以內容為主導推動數字出版的發展，但我國現有的學術期刊出版單位的規模仍然偏小，內容資源、傳播資源及數字出版人才資源的積累不足，要想在現有的學術期刊數字出版格局和市場競爭中分得一杯羹，可謂是困難重重。因此，我們需要對已有的數字出版模式進行反思，探尋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的發展規律，順利完成從傳統出版向數字出版的轉型。

在學術期刊數字化轉型過程中，要充分發揮內容和技術兩個方面的作用。首先，在學術期刊的數字化過程中，應堅持內容為主導。因為，學術期刊未來能否獲得更大的發展，能否繼續生存，關鍵不在於其是以紙質的形式存在還是以數字媒體的形式存在，關鍵要看作者是否還需要通過學術期刊來傳播他們的研究成果，讀者是否還需要通過學術期刊來獲取他們想要得到的有用信息，要看哪種媒體形式更能滿足期刊讀者的閱讀需要。學術期刊作為以刊載研究發現和創新成果的學術論文、文獻為主的定期連續出版物，內容的獨到性和創新性是其優勢所在。在新媒體的衝擊下，學術期刊的數字化轉型依然需要以內容吸引讀者，滿足讀者需要，並適應其已然變化的媒體接觸習慣和閱讀喜好。

其次，學術期刊從傳統出版向數字出版的轉型，離不開技術的推動。傳統媒體數字化轉型不是要傳統媒體從業人員自己去開發數字出版新技術，而是要實現傳統媒體與互聯網、計算機等新技術的有機融合，二者在合作的基礎上實現媒體內容的最大範圍的傳播，完成出版內容和出版過程的數字化轉型。在新技術的推動下，學術期刊無論是在出版編輯過程中還是在傳播形式上，都發生了諸多變化，而且這種變化會隨著新技術的出現和人們創造力的發揮，不斷地給學術期刊的編輯出版和傳播帶來新的變化、新的驚喜。

總之，在學術期刊從傳統出版向數字出版的轉型過程中，內容的創新和技術的創新缺一不可，誰也不能替代誰。沒有優質的內容，技術再先進，也遲早會被拋棄，如在我國曾經風靡一時的幾十種數字閱讀器，就是因為缺少優質的數字內容做支撐而成為“過眼烟雲”，上市不久就消

失得無影無踪了。同樣，沒有技術的創新和推動，優質的內容也難以得到快速、有效的展現，很可能像淹沒在海洋中的一朵浪花，渺無踪影，無處探尋。因此，要讓數字出版走得更遠、路途更順暢，就必須將二者有機地整合起來，消除學術期刊出版單位與技術提供商和數據庫運營商之間的利益壁壘，形成合理的產業分工，打造完整的出版產業鏈條，為學術期刊出版搭建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和發展平臺。

三、出版體制改革與學術期刊數字化轉型

從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雖然我國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的發展方向日益明確，但要真正實現從傳統出版向數字出版的轉型，實現學術期刊的多媒體互動，仍然存在著很多問題和困難，現有的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狀況還不能令人滿意，傳統學術期刊的出版人仍然深陷於“不做等死，做了找死”的困惑之中。為什麼國外的大型出版商能夠搶佔先機，引領數字出版的潮流，而我國的傳統出版業却尋路無門，不見起色，其中，有許多深層次的原因值得我們思考，傳統的學術期刊管理體制、運營機制、領導體制等等都亟須做出調整和改革。我國正在進行的報刊體制改革，在改革方案的設計和總體規劃上，應該考慮數字出版的特殊要求和學術期刊的特性，通過改革，推動學術期刊數字化轉型的進展，為學術期刊的未來發展注入持久的動力。

第一，發揮政府宏觀調控作用，為學術期刊從傳統出版向數字出版轉型營造良好的環境。

政府應進行頂層設計，制定促進數字出版產業發展的相關政策，對學術期刊的數字化轉型給予政策上和經濟、技術方面的支持。近日，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財政部聯合下發了《關於推動新聞出版業數字化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就新聞出版業數字化轉型的總體要求、主要任務及保障措施做出了部署。^④就學術期刊的數字化轉型而言，在宏觀管理層面，應在以下幾個方面有所改變，消除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的發展障礙。

(1) 改變現有的期刊管理體制，促進學術期刊出版單位的有效整合，打造具有一定規模的學術期刊出版集群，改變學術期刊編輯部規模小、分布散、力量弱的情況。由於我國報刊管理的主管主辦制度在短期內還不能改變，也不可能在短期內打造出如英、美等國那樣的大型出版集團，因此，學術期刊出版集群的組建可以先在部門內、行業內或地區內進行，條件成熟後可以打破部門、地區、行業的界限，實現跨部門、跨地區和跨行業聯合，實現學術期刊的規模化、集約化經營。在整合的同時，學術期刊出版集群可以著手發展以內容提供商為主導的學術期刊數字出版，或者聯合技術提供商和數據庫運營商，共同開發有利於學術期刊發展的數字出版模式。從我國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的過程及國外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的經驗來看，如果傳統學術期刊出版單位自建網站獨自經營，其從點擊率和下載率中獲得的收益不會很大，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從而難以完成從傳統出版向數字出版的轉型。可行的路徑是：多個出版單位聯合起來，形成具有一定規模的學術期刊出版集群，提高資源聚集度，進行已有資源的整合和再開發，建立擁有海量資源的學術期刊數據庫，形成合理的產業鏈和贏利模式。新的期刊出版集團的打造，將會改變目前我國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由技術提供商和數據庫運營商獨攬天下的局面。

(2) 政府應加大對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的扶植力度，在資金投入、稅收政策傾斜方面對學術期刊提供支持。我國學術期刊數字化的發展情況不理想，與缺乏融資渠道、資金投入量小有直接的關係。學術期刊是以發表學術性研究成果為主的，受眾範圍有限，很難通過發行量和廣告實現盈利。而目前在我國，政府運用經濟手段進行期刊管理的經驗不足，對所有期刊實行同一稅率，

這對於學術期刊的發展不利。因此，在學術期刊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政府有關部門應加大資金支持力度，或者成立專門的學術期刊出版數字化轉型升級基金，或者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使學術期刊出版單位在政策的引導和規範下利用各種融資渠道，發展數字出版業務。

(3) 鼓勵學術期刊在出版紙質期刊的同時出版數字期刊。我國對期刊的管理實行的是審批制，這給學術期刊進入數字出版領域設置了門檻。我國的大部分學術期刊出版單位是沒有獨立法人資格的編輯部，在沒有完成轉企改制的任務之前，無法得到同時進行數字出版的許可。數據庫運營商擁有的是數據庫的經營許可而不是期刊的數字出版權，無法為單本學術期刊提供數字出版的便利。因此，目前我國學術期刊中進行一次出版的數字期刊數量很少，而將現有紙質期刊內容上網是屬於二次出版的性質。鑒於這種情況，為了鼓勵傳統出版單位直接參與到數字出版的過程中去，應該在數字出版的管理和准入方面做出相應的調整。

(4) 政府應儘快完善與數字出版相適應的期刊管理辦法，制定數字出版環境下的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法規。數字出版的發展，還需要相應的管理措施和法律法規來配合和規範。我國現有的《出版管理條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規定》中都缺少與數字出版有關的內容，明顯落後於數字出版規範化發展的需要。另外，數字傳播條件下著作權的保護是擺在出版界面前的一道難題。一方面，在數字化傳播過程中，侵權現象嚴重，一些機構和個人在未得到學術期刊出版單位和作者授權的情況下，擅自將期刊內容收入數據庫，損害了學術期刊和作者的利益。另一方面，按照我國著作權法的規定，出版單位對期刊行使的是“著作權的鄰接權”，這使得出版單位在對傳播內容進行再加工、再集成、再整合時受到限制，難以有效地利用出版資源。因此，要利用現代數字技術和互聯網技術發展學術期刊數字出版，法治環境的營造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期刊出版管理部門應根據迅速發展的數字出版的需要，適時地修改和調整相關的法規和管理辦法，為數字出版的有序、順利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

第二，借鑒國外經驗，建立學術期刊非營利出版制度。

學術期刊是刊登學術創新成果，進行學術交流、學術傳播的主要載體和平臺，這決定了學術期刊具有公益性質，屬於公共產品，因此，不應被完全推向市場。但這並不意味著政府對學術期刊要包攬一切，將學術期刊與市場徹底分隔開。考察國外學術期刊的辦刊機制，我們可以看到，為了扶持學術的發展，許多發達國家的學術期刊雖然是以市場化運作為主，但政府却把大學出版社和學術期刊都界定為非營利性質，實行免徵增值稅或減稅政策，並通過基金資助或補貼的方式對學術期刊給予經費上的支持。我國應借鑒國外學術期刊的運作模式，加快我國非營利出版機制的形成和完善，讓學術期刊在獲得政府和社會支持的前提下，參與市場運作。實行非營利出版，由於期刊出版活動的目的不是為了營利，而是服務於學術交流等特定目的，這樣既可以使學術期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運作，開展市場經營活動，又可以保證學術期刊公益性目標的實現，保證其服務學術交流和科學文化發展職能的正常發揮。

第三，發揮期刊出版主體的作用，使學術期刊數字出版步入良性發展的軌道。

出版體制改革可以為傳統學術期刊向數字出版轉型營造良好的宏觀環境和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與此同時，作為數字出版直接參與主體的學術期刊出版者也應積極探索數字出版和數字傳播的規律，善於運用數字出版和數字傳播的新技術、新方法，儘快從數字出版的困惑中走出來。由於中國出版業的管理體制和產業環境與英、美等出版業發達的國家有很大差異，因此，不能簡單地複製國外的成功經驗，要探索新的、符合中國學術期刊實際情況的數字出版模式。學術期刊的

出版者在做好優質內容的同時，要改變傳統出版的思維定式，積極參與數字出版的過程，發揮主體作用，充分利用互聯網和數字技術提供的製作手段，對整個編輯流程實施網絡化管理，同時運用多種媒體形式，對期刊內容資源進行深度挖掘、利用和廣泛傳播，使內容資源的價值更大化。就目前的狀況看，傳統的學術期刊出版單位仍要和技术提供商、數據庫運營商加強合作，以新技術的開發和運用為學術期刊的數字出版提供技術支持和內容傳播通道。但在合作的過程中，學術期刊出版單位要順應數字出版的要求和規律，按照市場運作的規則，強化期刊內容的版權保護意識和自身的利益訴求，增強談判能力，探尋更加合理、有效的合作方式，為學術期刊出版的數字化轉型升級及期刊的可持續發展贏得主動。技術提供商和數據庫運營商也應在鞏固自身優勢的基礎上，調整經營模式和經營理念，樹立互惠共贏、協同發展的合作理念，與學術期刊一道為作者和讀者打造不受時空和地域限制的內容服務平臺、信息獲取平臺和交流互動平臺。

①周蔚華等著：《數字傳播與出版轉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69～70頁。

② <http://china.elsevier.com/elsevierdnn/ch/> 關於愛思唯爾 / 概覽 /tabid/625/Default.aspx.

③ <http://www.springer.com/about+springer/what+we+do/publishing+fields?SGWID=0-176004-0-0-0>.

④ <http://www.sagepub.com/home.nav>.

⑤劍橋大學出版社2014年期刊價格一覽表，<http://journals.cambridge.org/action/stream?pageId=4820&level=2>.

⑥劉建生：《數字出版需要大整合和大投入》，<http://finance.sina.com.cn/hy/20110108/20409223269.shtml>.

⑦劉曉昆：《IT技術引領期刊出版變革推動期刊領域走向轉型》，北京：《傳媒》，2010年第11期。

⑧郝振省主編：《2012～2013中國數字出版產業年度報告》，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3年。

⑨[美]伊麗莎白·愛森斯坦：《作為變革動因的印刷機——早期近代歐洲的傳播與文化變革》，何道寬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02頁。

⑩[美]保羅·萊文森：《數字麥克盧漢——信息化新紀元指南》，何道寬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社，2001年。

⑪新出政發[2010]7號：《新聞出版總署關於加快我國數字出版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2010年8月16日，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1/content_1778072.htm。

⑫陳穎青：《數字出版與長尾理論》，北京：華夏出版社，2013年，第20頁。

⑬吳伯凡：《專家推薦序二》，載[美]克里斯·安德森：《長尾理論》，第XVI頁，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

⑭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財政部：《關於推動新聞出版業數字化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新廣出發[2014]52號），http://www.gov.cn/xinwen/2014-04/30/content_2669106.htm。

作者簡介：武京閔，《中國人民大學學報》副主編、編審。北京100872

[責任編輯 劉澤生]